

我和我的祖国

1949-2019

吴贻弓：岁月厚重，理想总不肯泯灭

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里，“第四代”是那样独特。他们生在新中国成立前，长在红旗下，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艺术家。岁月厚重，怎样的能量才能穿透时间，支撑“第四代”的作品至今释放着长久的生命力？

2012年，已与中国电影、上海电影相伴了60余载的吴贻弓荣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。回

想那一幕，他的感言里藏着答案：“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，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。我以前常说，金色的童年、玫瑰色的少年，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，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。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，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、信心、诚挚的追求、生活价值取向、浪漫主义色彩等等，总不肯在心里泯灭。”

自1948年随父母迁来上海，吴贻弓的生命就与这座孕育了中国电影的城市紧紧相连。他和亲人们一同迎来上海解放的喜悦，在上海的许多影院里确定了一生的择业方向，又在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海派电影的文化气息。

“我觉得，一个人，只要认真地去去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，做成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”

38



1956年，吴贻弓考入北京电影学院。



吴贻弓（左一）在《阙里人家》拍摄现场。



1983年，《城南旧事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鹿奖。

【人物档案】

吴贻弓，祖籍浙江杭州，1938年生于重庆，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同年回沪工作。先后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、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，参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。获“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电影导演”“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”等称号。还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、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。中共第十四届、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。主要电影作品有：《我们的小花猫》《巴山夜雨》《城南旧事》《姐姐》《阙里人家》等。其中《巴山夜雨》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奖，《城南旧事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鹿奖等国内外奖项。

无论经历多少身份 最珍视的是“导演”

吴贻弓的电影启蒙来得比同辈人更早。父亲就是他电影路的启蒙人。有两点可佐证：父亲喜爱文艺，抗战胜利后他常带家人去看电影；父亲的授业恩师包括李叔同，这让吴贻弓“有种莫名的自豪感”，以至于后来他在《城南旧事》中用了那首《送别》。上海刚解放那会儿，平安、美琪、金门、新华、大光明、国泰、大上海和卡尔登影院都留下了少年吴贻弓的足迹。时间久了，他萌生自己制作电影的奇想。他找来硬纸盒，在盒底挖个小洞，后面安上手电筒，上下各装一根细铁丝，一台原始放映机便成了。再收集些父亲烟盒外层的玻璃纸，将它们首尾连接，用毛笔画出故事，“胶片”也有了。每晚饭后，父亲问“今晚演什么”，小吴贻弓便搬出他的家什，关了灯，把“胶片”卷在细铁丝的轴上逐格拉去，手电的光把那“写意”影像投到墙上。至于声音，由吴贻弓现场配音。如今已是耄耋老人，可那段天真时光其实印证了长久以来的坚持，“所有称得上，导演是我看重的一个”。

内卖出115个拷贝，相当于收进80多万元票房，在1980年代蔚为可观。

细致入微的风物、绵长的意蕴、悠悠弥漫的情感，“家”“童年”“往事”，《巴山夜雨》和《城南旧事》里，这些意象无形又有形。看《巴山夜雨》，银幕上的航船从蒙蒙烟雨中穿越峡江驶往黎明，观众总会一致沉入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意境。《城南旧事》里，当镜头穿过月洞门游弋于老院的院墙和窗格上寻踪往事，人们不禁想起童年里夏天的风、田间的路、小伙伴的光脚丫。而当小英子在天真齐唱的骊歌中兀自陷入沉思，一个孩子心灵成长的微妙变化穿过极筒的镜头，在观众心里荡出涟漪，言有尽意无穷。这便是吴贻弓电影最别致的特征了，他不那么注重传统的戏剧冲突，更偏爱用视听语言层层晕染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在被评论家们称为“散文诗”的吴贻弓电影里，观众们总能获得这样的直觉反应——道是寻常，却有万千心事涌上来。

但在导演心里，自己不应拘于“抒情散文诗”。他拍《姐姐》，用全新的影像语言表达意念和情感；他拍《流亡大学》，鼓舞抗日壮歌的激情；他给《少爷的磨难》当总导演，与张建亚一起以喜剧讽刺金钱；他在《阙里人家》《月随人归》里注入对家庭伦理的深入思考；动画电影《宝莲灯》、电视剧《走出凯旋门》、音乐剧《日出》等都有他的参与。吴贻弓说：“成功是很重要的。但在每一次成功后，又往往会感到新的茫然。因为再一次向成功发起新的冲刺时，需要的不仅是努力，更是勇气。”

尽力而为的过程中 帮别人做几件“嫁衣”

很多时候，才华与责任既相随又无法两全。1984年，吴贻弓获悉自己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。那会儿，人在外景地的他不会想到，未来等着他去履新的还有一长串职务。再后来，有个问题跟了他很久。“行政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，创作自然少了，后悔吗？”他答：“要说一点不后悔，那是假的。但转念想，后悔有什么用？事情总要有个人去做。组织安排，我就尽力而为。想想在这过程中多少帮人做成了几件嫁衣，也能得到些许安慰。”最大的那件“嫁衣”，非上海国际电影节莫属。1993年创办第一届，1995年第二届时即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认可为国际A类，到如今开幕在即的第22届，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电影文化、中国观众观看世界的重要窗口。如同人之成长必然经历蹒跚学步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展何尝不是一条磕磕绊绊的小路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中国电影进



天真对于艺术 乃是不朽的生命！
吴贻弓

▲对吴贻弓而言，电影就是一个梦。

▲吴贻弓寄语：“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！”
(均受访者供图)

千方百计在作品中 投射“共和国情结”

《城南旧事》导演阐述里一段文字很特别：“‘祖国’的含义是什么？我不一定能讲得清楚。她既抽象又具体。抽象可以到无限博大，具体可以到极其细微。有位诗人说：祖国就是他故乡门前那条小河；而当我在意大利正苦于那里盛筵上的生肉、生火腿、生香肠，突然在我们使馆的食堂里喝到一碗极普通的大米粥的时候，似乎祖国的含义全在这一碗稠稠的、热腾腾的、又带着不尽甜意的粥里了。”

1938年12月，吴贻弓生于重庆。喜报辗转传到已沦陷的老家杭州，阖家欢喜。大伯父给他起了名——“贻”为收藏，“弓”指代兵器，“刀枪入库，天下太平”，生而便与“国”血肉相连。少年时代的一则家规，又给了吴贻弓关于“祖国”的一重感性认知：每年除夕吃年夜饭，吴家都会全体出动去看一场国产电影，“无论那天排映国产片的影院离家多远，也绝不就近观看西片”。

1983年1月9日，吴贻弓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着《城南旧事》参加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。经一周角逐，这部中国电影脱颖而出，夺得了最高奖——最佳故事片金鹿奖。那一回，他深深体会到“祖国”两字的分量。

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摘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，《城南旧事》的征途并不平坦。彼时，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号称亚洲第一，参赛国家众多。以当时中国电影的标准来评判，《城南旧事》的53万元成本称得上大制作了，它几乎是同时段上影平均拍片成本的2.5倍。但在马尼拉，这部作品竟是所有参赛片里耗资最低的一部，与投资额倒数第二的影片相比，也仅是其三分之一。“单就这点来说，我并不介意。因为在我们国家，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拍出相当于人家好几倍成本的影片来。”吴贻弓回忆，他真正担心的，是美国等参赛方的“经济压力”，用钱砸出营销阵仗，这是《城南旧事》不可比的。

但事实证明，经济大棒并不奏效。和所有参赛片一样，《城南旧事》在电影节原定只放映两场：一场供评委和观众同时观看，另一场全部面向普通观众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，马尼拉当地华侨蜂拥而至，争相观看这部“来自祖国”的电影。

人，络绎不绝地来，组委会不得不加映一场。影院门前，等候的观众排成了长龙。中国代表团带去的2000份资料，早在第一场放映前就被一抢而空。最后一场，连场内过道都挤满了人。吴贻弓留心一看，发现挤在过道上的几乎都是记者和电影节工作人员，“他们被前两场观众的高涨热情所感染，挤出时间，摆出工作，争着来看个究竟”。一个来自中国的故事打动了所有人，不仅在华侨心里深深留痕，也触到了各国评委、记者的心底柔软处。一时间，“来自中国的影片出乎意料地使马尼拉升温”的报道压倒了一切，使得先前一些国家的宣传攻势全都黯然失色。

1983年1月16日，吴贻弓的期盼成为现实。颁奖典礼当晚，中国电影代表团全体成员步入会场。走在队伍最前列的，是一名高擎五星红旗的菲律宾总统卫队士兵。行进在国旗之下，除了“自豪”，吴贻弓再也不想不出第二个更适合的词来描述心情。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作为一名电影导演，能得到这么大的荣誉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荣誉是和我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！”回到上海，他写下：“祖国”是什么？祖国不就是你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么？

1992年伊始，吴贻弓前往曲阜拍摄《阙里人家》。那几年出国热让吴贻弓不停思考：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当代都市生活的潮流下将如何传承。他理解一些人的选择，但绝不能接受另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否定。“我认为生活中有人抱怨自己的遭遇，抱怨贫穷都可以理解，但抱怨自己是黑眼睛黄皮肤，这一点我不能赞同。一个人如果连这点都否掉，那就完了。”正因为此，人们从《阙里人家》品出如是意味：阙外千重浪，阙里一家人。

去年秋冬，吴贻弓80周岁之际，上海市文联汇编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撰写的“海上谈艺录”吴贻弓专册《流年未肯付东流》出版。书中辑录了一位电影人与一位电影学者的对话，让人动容的不止于其间流淌的电影理想，更是一股深植于家国情怀的绵绵之力。回顾自己的创作心境，吴贻弓用了“共和国情结”五个字。他们这一代人在时间的长河里曾历起伏、分流，但他说——“归根结底我们的内心情结还是很单纯的‘共和国情结’，我们总把新中国看得很理想、很美好、很亲切，并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在银幕作品中”。

记者手记

天真长存

说来有些意外，无意间把少年“领”进电影门的父亲，却在1956年吴贻弓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，明白地持反对态度。是他自己的坚持外加母亲暗中支持，他才走上了一生之路。父亲为何反对，直到老人家过世，他们父子间都未再提那次分歧。只是在后来追忆时，母亲告诉吴贻弓：“当年爸爸是怕你掉进一个大染缸里染黑了自己。”解开了30多年的谜团，吴贻弓并未松了一口气。相反，他“满嘴地反思，父亲的担心是否有道理”。

1980年代他与时间抢时间的夜以继日；更看见他接续前辈的路，磨砺十年捧出了一部《上海电影志》……有个细节可见一斑。关于《城南旧事》，吴贻弓至少写过三个版本的导演手记。第一次成稿于1982年，即电影刚刚诞生时。此后，1990年代、2007年他又两易其稿，增补的内容无不都是这些年对创作的反思、对艺术的更深沉体悟。可外人不解的是，第一稿已相当完整，以致被许多电影学者称为“论文”。

时间是最公允的。时间看见初出茅庐的他扎扎实实地在剧组当“超级助理”；看见非常时期仍希望不堕“时刻准备着”；看见

他犹记得沈浮导演当年与他说，“岁月流逝，但愿天真长存”。因为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。耄耋之年，吴贻弓仍是天真的电影守护者。

